

# 台湾经济发展的进程与模式：一种综合研究途径

## ——对李非教授新著《台湾经济发展通论》的解读

李 鹏\*

1979年以后，随着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两岸关系的缓和，两岸经贸关系开始逐步发展；1987年11月，台湾当局被迫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速度更加迅猛；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初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态势。伴随着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步伐，祖国大陆有关台湾经济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开展起来。如何全面地、系统地、历史地、客观地来把握现代台湾经济的发展脉络，考察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趋势，一直是台湾经济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2004年6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非教授的新著《台湾经济发展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就这个课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和详细的探讨。

李非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涉足于台湾经济研究，在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笔耕不辍，完成了十几部专著和200多篇的学术论文，成果之丰在台湾研究界实为鲜见。《通论》是李教授在20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他将自己的真知和同行们的灼见进行了仔细地研读和甄别，取精用弘，探赜索隐，终能自成一说，成就了《通论》。《通论》一书既是这些成果的总结，又是这些成果的精炼和升华。与以前海内外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这本专著篇幅（十六开本、529页、50万字）更加宏大，材料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全面、体例更加完整，叫做“通论”是名副其实。作为从事台湾经济研究的“南派”代表人物之一，李非教授很强调要“侧重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序言），就《通论》来看，作者在学术理念、理论思辨、资料梳理和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通读全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通论》的确是目前海内外对台湾经济进行综合研究的上乘之作。

《通论》共有四篇二十五章，作者用丰富的资料数据、完整连贯的逻辑、严格明确的学术规范，完整清晰地阐述了台湾经济发展进程及其模式特征。它在考察台湾现代经济启动、恢复、起步、起飞、调整和转型各个阶段的发展和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台湾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它还详细分析了台湾对外经贸关系和经济发展，论证了台湾经济发展成果与成因，剖析了台湾经济问题。此外，作者还大胆地对台湾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性的分析。对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复杂背景、情势、细节的微妙把握，作者都阐释得非常精准。笔者读后总的印象是：《通论》不仅能够给人阅读的兴趣、知识的滋养，而且能够启迪人的思维、提升读者的理论方法水平。笔者将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以台湾经济的研究途径为切入点，对《通论》一书作出个人粗浅的解读。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 研究途径和方法

方法论是指对给定领域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是对经济学中研究的一般途径的研究,它既提供应用知识,也提供对专业基础的新的理解。<sup>[1]</sup>研究途径并不完全等同于研究方法,它还包括研究的视角和过程等。科学的研究途径对包括台湾经济研究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领域都至关重要。作者在序言中提到,台湾经济研究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既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特殊的研究方向,也是台湾问题研究的重要领域”;它在性质上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范畴,但作为一个经济体又有相对特殊和差异的一面(序言);从研究分类上来说,它既包括经济学基础研究的内容,又涉及到祖国统一、“以经促政”等现实政策的应用研究。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单纯进行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单纯把它当作区域研究或特殊的国别经济研究都不合适,只有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全面系统地揭示台湾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

从整体上看,《通论》一书运用的是综合研究途径。综合研究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面分析和重点分析的结合,全面分析是对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都进行研究,然后得出一个综合性的结论;重点分析则是强调分析影响问题的最根本的方面。<sup>[2]</sup>这两种途径的综合分析,一方面,可以使研究与客观实际情况更为接近,解释更为全面;另一方面,有助于分清主次,厘清因果关系,针对性也更强。一般的综合研究由横向和纵向、时间和空间、静态和动态、点线面等多条立体交织的脉络构成。在《通论》中,这些脉络都有比较突出的反映。作者先以时间顺序纵向描述台湾经济的发展阶段和结构变化特征;然后在岛内的空间中,横向重点分析台湾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而后将台湾经济发展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即国际、区际和两岸的背景中,探讨台湾的对外经贸关系。就具体的问题点而言,作者不仅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经济问题进行了静态的描述,而且还对它经济发展的模式、规律和趋势,外部政策及环境因素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动态的分析。通过纵横交错、静动结合、重点突出的处理,《通论》完整地向读者展示了台湾经济发展进程和模式的立体图画。

在确定研究途径后,作者依照台湾研究的特殊定位,选择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和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为指导,以区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参考了西方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方法的运用上,作者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以历史分析法来阐述台湾经济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以系统分析法来探讨台湾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走向,以结构分析法来论述台湾经济发展的层次和结果,以定量分析法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台湾经济量化指标及相关系数,以比较分析法来考察台湾经济发展形式和特征”(序言)。虽然这些分析方法都较为常见,但作者却能够根据研究需要,将它们恰到好处地运用到各种研究问题中去,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精确性、可靠性和科学性。

## 进程、结构与趋势

对台湾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是综合研究途径的重要一环。台湾经济发展既有内部条件,又有外部条件;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现实因素,又有历史因素。我们必须全面地、历史地、客观地加以分析。<sup>[3]</sup>在《通论》的第一篇“台湾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中,

作者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等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但作者并不是像史学家一样去考证史实的真实与否，将这一篇写成“台湾经济发展史”，而是根据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知的历史事实，提炼、总结和分析出与台湾经济发展有关的经验和规律，并将它作为后期预测的基础之一。

作者首先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台湾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1页）。对于如何划分台湾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角度、方法和依据。旅日台湾学者刘进庆教授从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历史的观点出发，将近现代台湾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清末、日据和战后等三个时期，日据时期又被细分为完善基础设施（1895-1904）、开发米糖农业（1905-1930）、军事工业有所进展（1930-1945）三个阶段；战后时期又被细分为整编期（1945-1952）、复兴期（1953-1963）和发展期（1963-今）。<sup>[4]</sup>《通论》则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条件和经济指标，将现代台湾经济发展进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第一阶段是现代经济的启动与恢复时期，时间跨度为20世纪30-40年代；第二阶段是现代经济的起步与起飞时期，时间跨度为20世纪50-70年代；第三阶段是现代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时期，时间跨度为20世纪80-90年代。二者相比，两位教授在分期的时间点上有不少相同之处，而《通论》的划分显得更为细致。

在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之后，李教授以台湾经济结构形态的变化作为主线，贯穿全篇的每一章。这样的处理可以让台湾经济发展进程的主要脉络清晰系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各个章节相互衔接，从而避免了历史材料的无序堆砌。经济结构形态是作者分期的最主要依据，之所以将20世纪30年代作为台湾近代经济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是因为台湾的经济结构那时开始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转变为半农半工的二元结构形态。经过战前工业化、战后经济重建和20多年的发展，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初，已逐渐步入工业化社会，初步形成以加工出口工业为龙头的外向型经济格局，经济结构从二元形态转变为工业化形态。在经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两次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台湾经济从快速扩张转入调整发展时期，经济结构形态也从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概括地说，台湾经济发展在产业发展上呈现出“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相互联系支持、依次逐级提升的阶段，这是作者所发现的台湾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规律。作者对台湾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不仅只有上述这些粗线条的呈现，而且对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时期的产业结构、生产形态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除了每一个阶段的经济结构形态外，作者还对各个阶段各个时期整体经济发展的背景、环境、状况、原因、影响作了描述和评析，我们很容易从《通论》第一篇的论述中，对各个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做出一些定性的归纳。台湾现代经济启动的日据时期具有生产的畸形发展、交换的不平等性和分配的不合理性等典型的殖民地特性；恢复时期的台湾经济曾面临社会极不安定、人口大量增加、通货恶性膨胀等无数困难，美国的经济援助对稳定局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起步时期的台湾经济依附美援，通过选择内需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起飞时期的台湾经济得益于趋于成熟的内部条件、有利的外部环境，以及以外销为导向经济发展策略；调整期的度过是由于第二次进口替代和高级出口扩张的发展战略，使台湾经济从低迷状态重新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经济在生产形态、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转型。

在第四篇第二十二章，作者接着第一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台湾经济发展特征进行了论述。90年代台湾泡沫经济破灭，标志着岛内经济系统矛盾失衡（第420页）。21世

纪初，台湾经济出现 50 年来罕见的衰退，各项经济指标全面恶化，创下战后最低记录，从而标志经济发展从“中增长”阶段逐步转入“低增长”阶段，甚至从长盛期开始进入长衰期（第 482 页）。

历史分析法的一个优点在于历史发展本身有一定的规律，通过历史分析所得出的规律和经验，对现实预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作者对未来台湾经济发展趋势做出了大胆预测，即“未来台湾经济走势表现在产出总量上，就是大致保持低度成长趋势，至 2010 年总体经济规模在 2000 年的基础上再扩大 50%，实现一定量的增长，从而在总量上继续排名世界第 20 位左右；表现在结构变化上，就是逐步向技术型与服务型产业演化，不断迈向后现代经济社会，至 2010 年达到发达地区的中等水平”（第 496 页）。作者的这一结论并不是主观臆测和缺乏实证基础，而是在分析台湾经济发展进程和结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经济增长预测模型”，进行高位、中位、低位预测，然后对预测值进行修正并综合考察后得出的结果，方法上的科学使预测数值的准确度更有依据和保证。

历史分析法同辩证逻辑思维密不可分，任何对历史事实的认识都是与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相联系的，它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本来面目的反映。<sup>[5]</sup>作者在使用历史分析法评述台湾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征时，特别注意做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避免出现历史与现实的错位认知。作者在分析战前台湾经济发展的后果及影响时，提出“要把握主观动机与客观后果的关系，即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殖民目的与台湾现代经济基础得以建立的客观效果；区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即日本对台湾经济掠夺的真实本质与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表面现象；分清主要与次要的关系，即日本进行殖民经济掠夺所获得的好处远远大于当地经济发展所获得的利益”（第 29 页）。此外，对美援在台湾经济恢复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也是给予了非常客观的评价，认为“它不仅促进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规定了台湾经济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奠定了经济后续发展的基础”（第 55 页）。

## 模式、政策和问题

台湾经济发展模式是《通论》一书的另一个论述重点，是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横向分析途径。在 20 世纪后半期，台湾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很多学者都从正面对台湾经济模式进行积极的分析和论证，甚至有不少人以“台湾经验”、“经济奇迹”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成为被世界经济界广为关注的“东亚模式”的一部分。进入 21 世纪以后，台湾经济遭遇到史无前例的困境，台湾研究界开始出现从负面检讨评析过去和现在台湾经济发展模式的现象。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台湾模式”和台湾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避免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错误，李非教授在《通论》一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容包括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等，即政府采取何种方式动员整个社会资源，将资源配置在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发展体系，迅速实现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sup>[6]</sup>李非教授在《通论》的第二篇对台湾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建设计划、土地改革政策、加工出口区、重点工程建设、科学工业园区、营运中心计划进行全面地论述后，得出结论，台湾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介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第三条经济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李教授更进一步说明了台湾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表现，即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通过法律规章为经济制定“市场规则”，创造相对有序的竞争环境，又采取与市场规律相适



应的经济手段，运用货币、信贷、税收和外贸等宏观调控政策，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间接调节，有时为了社会经济稳定的需要，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和补贴政策，对涉及“国计民生”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基础性产业、策略性工业、甚至是竞争地位相对脆弱的传统产业进行保护和扶植。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保护了市场经济竞争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制定“游戏规则”，使竞争有序进行，并在宏观上加以政策调控，尽量避免经济波动和危机，同时通过保险、补贴以及救济等手段，缓和私有制及竞争必然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以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序言）作者这一结论性的论述是建立在对台湾经济发展历程和模式的全面了解和深刻剖析基础上的，无疑极具说服力和学术价值。

在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资本，更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经济政策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sup>[7]</sup>作为典型的海岛型经济体系，台湾资源不能自给自足，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实现对外投资来加速资本形成的规模和速度，扩大对外经济联系，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通论》一书分三章论述了台湾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情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教授运用了经济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市场垄断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发展阶段论、内部化理论，以及管理学中的“追求市场”型、“追随客户”型、“寻求资源”型、“策略考量”型等四种类型的“竞争策略理论”，来分析台湾对外投资的动机和行为（第370页）。这些理论和台湾投资行为的结合分析，很好地解释了台商选择对外投资的原因和目的、投资地的选择、投资的产业领域、外移企业的本土化趋势等问题。

两岸经贸关系与台湾经济发展是台湾研究界长期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两岸经贸交流的规模急速扩大，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加上两岸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内地与港澳签订“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两岸经贸关系相互依存对两岸经济特别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分裂路线情况下的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前景等问题，都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通论》从区域经济学的比较利益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两岸经济发展现实等多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李教授认为，两岸经贸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具体反映。它所遵循的发展理论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原理，而具有多重因素、多重原理混合作用的特点。作者还总结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三大准则和四种效应，即市场经济准则、平等互利原则和产业优化准则，成长效应、开放效应、替代效应、整体效应。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李教授对两岸紧密关系的前景得出乐观的估计。他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经贸交流迅速发展，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可以拓展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为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开辟一条新的出路；台湾对外经贸关系也将“四环结构”简化为“日本进口——台湾设计——大陆加工与销售”的“新三环结构”，并最终将走向“双环结构”，即从利用日本高科技与大陆劳力和市场的“三角贸易关系”，转变为直接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直线连环关系”（第335页）。

研究台湾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目的是取长补短，从这一模式的历史演变中提炼出有借鉴意义的内容。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来说，研究台湾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帮助台湾对以往的发展模式作一个全方位的反思，而且对祖国大陆和台湾今后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也有具体的指导作用。作者用将近一篇的篇幅，分析了台湾经济发展进程和模式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没有片面强调和刻意地放大这些问题，而是指出，现代经济发展是一个矛盾的概念，

成就和问题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特性具有普遍性规律(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第453页)。这种认知使得作者在对问题的分析时,能够保持一种客观、平和的心态,这对学术研究者来说相当重要。因此,作者并没有就问题谈问题,而是将问题放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复杂系统运动中去探讨。无论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冲突、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失调、泡沫经济的膨胀与破灭、台湾经济逆转与衰退,作者都能够在方法上做到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从理论到实际,并结合当时的背景、台湾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外部因素的影响等进行系统地剖析。这种分析方式不仅使读者了解到台湾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问题,还提供了—个思考空间,即如何解决和避免这些问题。

## 结 语

作为一本名曰“通论”、约5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无论是写作还是对它进行介绍和评析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作者自己也表示“纰漏之处在所难免”。的确,书中还有一些细节可以继续斟酌,有些论述可以更加地深入细致,比如说对台湾经济和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通”直航问题,作者并没有辟专门的章节来论述,而是偶尔隐含在其它章节的论述之中,到底是基于结构内容的考虑而割爱,还是百密—疏,笔者不得而知。

笔者之所以倾向于从研究途径的角度对《通论》进行解读,是想化复杂为简单,将对方法的述评和对内容的介绍结合起来,使读者对李非教授的《台湾经济发展通论》有尽可能全面深入的了解。实际上,笔者在通读《通论》全书时,时时能够感受到作者在运用理论方法解释历史、现实问题的独具匠心,也折服于作者皓首穷经、搜索研究资料之精神,更钦佩作者治学态度之严谨踏实。勿庸置疑,《通论》—书的可圈可点之处,肯定不是一篇几千字的书评所能够描述和展现的,有兴趣的读者亲自研读《通论》,无疑会有更多的体会和收获。

### 注释:

- [1] (美)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7~28页。
- [2]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3页。
- [3] 李家泉:《关于四十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评估》,《转型期的台湾经济与社会》,时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3页。
- [4] 刘进庆、涂照彦、阳谷三喜郎著,雷慧英等译:《台湾之经济》,(台湾)人间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9、27页。
- [5] 王晖:《方法论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83页。
- [6] 孙煜扬:《谁主沉浮:东亚模式演变之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3页。
- [7] 伍海华:《经济发展与利用外资规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页。